

**白睿文：**在您小時候，好像是您母親讓您初次接觸到藝術和文學的。可以談談您小時候的文學啟蒙嗎？是什麼樣的因素使得您走上文學和藝術創作這條路？

**高行健：**我基本上沒有上過小學，我只讀了小學六年級。之前都是我母親教我認字，很早就開始識字。應該說8歲起就開始寫日記，是我母親教我的，往後就一直寫下去了。一直寫到文化大革命來了。我把自己的手稿——有30多公斤的手稿和筆記本——都燒掉了。

我母親是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的抗日救亡劇團。我是生在中日戰爭的那個期間，是在戰爭中出身的。我5歲的時候，第一次登上舞台是跟我媽媽，因為她們的戲裡面需要一個孩子。所以我5歲的時候就開始演戲了。

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裡面，當然我從小也喜歡畫畫，我10歲的時候——算是我的第一篇小說——把一個筆記本寫滿了。這個筆記本另外一面是白的，所以我就畫畫。我的插圖和我的第一個故事，類似於《魯濱孫漂流記》的，寫的一個自己幻想的，流浪的，冒險的生活。足足把一個筆記本都寫完了，記得是10歲的時候。所以從10歲的時候我就開始畫畫了。

我們家裡頭——在那個時代中國可能很少有這樣的家庭——可以說非常民主。小孩子做什麼事情，我父母都不反對，只要我不搗亂，而我不搗亂（笑）！所以不管我做什麼，都受到了鼓勵。所以我在一個良好的家庭環境中誕生。由於我父親喜歡中國文學，所以我們家裡頭藏了很多中國古典文學的書。我媽媽呢，喜歡西方戲劇和西方文學，家裡也有很多翻譯小說。我可以從小就看大人的書。所以讀書，在我小時候很早就接觸了。這是一個對我日後文學藝術創作的一個難得的條件。

**白睿文：**70年代末，當中國還處在一個相當封閉的階段，您隨著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個代表團到法國去考察，陪著巴金先生還有一些資深的作家。您當時還寫了一個散文〈巴金在巴黎〉。那一次法國之行，對您來講很重要嗎？它對您日後的創作，和您的世界觀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？啟發大嗎？

**高行健：**當時我是做為巴金先生的翻譯，是文革之後，第一個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國外。之後我當然又做了詩人艾青先生的翻譯，我又去過法國（France）和意大利（Italy）。因為我當時在中國作家協會當翻譯，我第一篇發表的文章就是〈巴金在巴黎〉，因為代表團回國以後當然需要一個報導，那麼我就寫了這一篇文章。可是我之前寫過幾百萬字，但都燒掉了，沒燒掉的也不能發表。我曾經把我沒燒掉的，後來寫的一些小說拿給了巴金先生看。巴金先生看了以後當然非常喜歡，以至於在

我們訪問巴黎的時候巴金先生向法國的作家介紹我說：「他（指我）是真正的作家。」我說「巴金先生，你不要這麼說。」因為我的身分只是一個翻譯。那時候我一行簽字都沒有發表過。

因為我之前讀過法文，我原來的工作單位有法文的刊物，所以第一次當到了西方以後，我對法國並不吃驚，因為從小起西方的文學我讀過很多，西方的主要作品我都讀過。我到了法國以後，並沒有很吃驚，這是在文學中，書中所看到的法國。但是讓我吃驚的是，參觀盧浮宮；第一次看到西方油畫作品中的傑作，讓我吃驚。然後第二年我又做為艾青先生的翻譯去了意大利，我去了佛羅倫薩（Florence）、威尼斯（Venice）、羅馬（Roman）等八個城市。我是安排日程的，因為他們不懂外文，所以我說：「博物館是一定要看的。」因此我把西方那些重要的藝術博物館的作品都看了，給了我震驚。因為在中國我看不到一幅西方作品的原作，看到的都是很糟糕的複製品，連複製品也很難看得到，但我有幸也能看得到。等我一看了真品以後，我想我就不要再畫油畫了（觀眾笑）！

我想這是一個重要的改變，以至於後來我想：如果我想畫畫出些名堂來的話，我不能畫油畫了，我只能找我自己的路子。這個時候我也有另外的啟發，我也參觀了畢加索（Pablo Ruiz Picasso）的水墨畫，上面寫著：中國墨。之後有一個很長的危機——就是我還能不能繼續畫畫。後來有一個參照，我覺得畢加索的水墨畫，還有其他幾位西方畫家的水墨畫也太簡單了，這跟我對油畫的認識恐怕也差不多（笑）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我想找些一條繪畫的方向的話，恐怕我要回到水墨畫。

**白睿文：**對很多人來講，中國的改革開放初期是一個很特殊的年代。中國封閉了那麼多年之後，突然間西方的哲學、藝術、音樂統統都進來了。與此同時也有很多人重新發現中國的傳統藝術。儒家、道學、佛學，這些傳統哲學也都回來了。在藝術領域方面有《今天》刊物，星星畫會、朦朧詩、尋根文學，還有您積極參與的「先鋒戲劇」活動。這個期間，78年到83年左右，對您的重要性？您那時候的狀況是怎樣的？那個時候您跟李兆華合作，有創造一些非常經典的話劇，有《車站》、《野人》、《絕對信號》。您可以談談那個時代嗎？

**高行健：**文革之後，終於中國開始允許文學藝術創作的恢復活動，包括以前解散的作家協會和文藝團體都開始恢復工作了。那個時候我藉著這個機會起頭發表我寫的這些作品，因此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叫做《現代小說技巧初探》，在廣州的一個刊物上。那個時候還是在70年代末，文學藝術出版物剛剛開始可以不做政治宣傳，我就在一個叫做《隨筆》的雜誌裡寫了一篇《小說可以怎麼寫》，本文談的就是除了官